

壹、勇往直前

前言

耶穌把大使命給了門徒，可是今天許多新約信徒對該使命的緊迫性卻不甚明瞭，也不瞭解這使命是初期教會急速增長的原動力。當時逼迫的狂瀾把基督徒分散在地中海一帶，基督教很快在各地生根，最初主要在有外邦人聚會的會堂裏，原來這些外邦人聽說有一個福音「不要求他們作猶太人，卻應許給他們心靈有自由」，便大為喜出望外，紛紛加入會堂。

一直到第一世紀末期，教會都是這樣在歐洲、非洲及亞洲逐漸建立起來。到第四世紀中葉，特別在羅馬帝國的東部，基督教運動如日中天，連帝王們也甘拜下風。可見新約所記載的大使命與其說刺激了宣教運動，不如說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信仰，更是一種自然的流露。耶穌曾說過陰間的門不能勝過祂，當然羅馬的勢力以及一再掀起的逼迫也不能止息那不可抗拒、勇往直前的浪潮。

傳福音和設立教會是新約時代的首要任務，但到了第四世紀，基督徒突然享有空前的自由，這時神學問題逐漸受人重視。教會領袖在外要排斥異端邪說，在內又要應付教義上的爭辯，神學家苦心整理出一套套的教條，教會議會又無所不辯，從基督的神性到女性有沒有靈魂都成為爭辯的焦點。教恩的真義和傳福音的任務反而被遺忘了。

後來化外人入侵，接續羅馬帝國覆亡，這些神學爭吵便暫告平息。西歐處在一片混亂中，正需要像格利一世（Gregory the Great）這樣雄才偉略的領袖來鞏固教會，重燃宣道的熱誠。他是羅馬的主教（主後590～604年），當時看見政教聯盟的必需，便建立了政治與宗教合作的模式。這個模式一直持續了數個世紀。他認為教會處在敵視的人群中，若沒有地上君王的軍事支持是很難生存的。

在所有統治者中，法蘭克族（Frank）帝王查理曼（Charlemagne）可說是最熱衷以軍事支持基督教的一位。他極力提倡聖經的抄寫及傳授，那種熱心在統治者中可說空前絕後。查理曼把基督教的形象廣傳到歐洲各地方，他也是卡羅林（Carolingian）文藝復興的主腦人。該運動揭起學術研究的風氣和五彩繽紛的基督教活動。

由於這些領袖的大力支持，基督教運動在中歐得以與化外人的勢力並駕齊驅。但另一方面，一個新的宗教——回教勢力，也在巴勒斯坦由東至西的擴張，跨越非洲，直達西班牙，他們的攻勢有如破竹，基督教卻節節退縮。直到主後七三二年的都爾之役（Battle of Tours），回教伸張的

氣鼓才被軍事勢力止息。中世紀多數教會領袖都認為武力是阻止這種強大威脅的唯一途徑，十字軍（1095～1291年）發兵東征，就是要從回教徒手中奪回失地。溫德爾（Ralph Winter）形容十字軍是「歷史上一格對基督教宣教意義最重大，最可悲的誤解。」¹ 結果他們還是達不到目的，而且把許多應放在真正宣教工作上的資源浪費了。

當然這不是說，中世紀時代沒有純正的宣教事業。塞爾特（Celtic）和亞流（Arian）的宣教士，在傳福音事工上有很顯著的貢獻，他們帶領了許多化外人歸入教會。羅馬天主教的教主，在向化外人傳福音上也扮演了很多重要的角色，例如本篤修道會（Benedictines）在荒僻地區建立修道院，發揮了他們特有的影響力。只可惜他們的財富越積越多，影響修士們不再專心追求屬靈的事，同時使修道院成為海盜（Vikings）襲擊的對象，終於導致沒落。

哥特族（Goths）、西哥特族（Visigoths）及汪達爾族（Vandals）攻陷了羅馬帝國，但與後來北歐海盜的侵略行為比較，已大為遜色。費禮榮（Herbert Kane）稱這些海盜為「英倫三島及歐洲的禍患」。他說：「他們對教會及修道院的破壞，差點終止了英國教會的宣道工作。」²

溫德爾也這樣寫道：「三個世紀以來，愛爾蘭如火山般爆發的傳福音熱誠也冷卻到差不多熄滅的地步。」可是修道院雖遭破壞，福音的見證卻沒有消滅。正如溫德爾所說，「基督教那不同凡響的力量」是不能被毀滅的：「因為被擄者的信心，征服人的變成被征服的。那些被販賣作奴隸的修道士，以及被迫作海盜妻子的基督徒女子，帶領了不少北部的蠻人歸主。」³ 無論如何，海盜之亂對英倫三島、中歐的塞爾特族（Celtic）和羅馬帝國穩定的傳統，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

許多聖經抄本與修道院一樣遭受破壞，這對宣教工作固然非常不利，但還有其他因素，使中世紀的福音工作受到更大的阻撓。原來中世紀的教會領導階層，多落在極可悲的境況中。教皇權力之大，招惹在職者濫用職權。到了第十世紀，教皇道德腐敗已達極點，有些教皇甚至是社會敗類。

司徒芬四世（Pope Stephen IV，公元772年）把前任教皇屍骸取出，立在椅上，在大公議會面前鞭屍問罪。後來他被下在監裏，不滿一年，便被敵手下招令處死。其他教皇在位時也公然違反律法，行不道德的事。在十四及十五世紀，東西教會分裂，產生了「二皇執政」的局面，有一段時

期甚至「三皇執政」，但這些局面對改進教會領袖形象和屬靈情況一點沒有幫助。

當時基督教因為深入政治漩渦，以致無心顧及宣道事工。在學術研究方面也是如此，以哲學及思辯為重的經院哲學系，吸引了教會最有思想的人，教育路線從實務研究轉向教義與理性調和。

史腓力(Philip Schaff)寫道：「這些忙碌的思想家本著勇敢無畏的信心，從事最高深的思辯工作。他們自問自答，提出各式各樣的疑問，又把已採納的教條逐個考驗，以證實確是無懈可擊。這些人是神學的武士，哲學是他們的奴婢，而邏輯辯證是他們的矛和劍。」⁴

從積極方面來看，此時期改革運動此起彼落，多方面潔淨教會。有些特別針對改良教皇制度，其中不乏較為成功的例子。修道院也有顯著的改革，還導致不少福音廣傳的活動。主後九一〇年，法國中部克呂尼(Cluny)修道院展開克呂尼改革運動，是修道院屬靈性革新的先河。緊接著就是克勒窩的聖伯爾納(Bernard of Clairvaux, 1090~1153年)滿有朝氣的屬靈事工及西篤會(Cistercians)的創立，後者還在歐洲帶來傳福音運動的復甦。

羅馬天主教內部最大的增長，是托鉢僧(friars)的崛起。這些到處傳道的僧侶，在中世紀末對教會宣教影響深遠。此外，方濟會(Franciscans)創於主後一二〇九年；道明會(Dominicans)創於一二一六年；耶穌會(Jesuits)則創於一五三四年，他們在歐洲，甚至世界各地設立教會，創辦修道院。

對當時許多基督徒來說，這一切的革新還不夠徹底，因此在中世紀出現了一些運動，是直接反抗羅馬天主教的，目的是要潔淨教會。瓦勒度派(Waldensians)就是最重要的例子，他們當時被列入異端，事實上卻比許多天主教徒更接近新約的基督教；他們很注重傳福音、查經和個人對基督的委身。十二至十五世紀，他們在中歐及東歐非常有影響力。十四世紀開始，威克里夫(Wycliffe)和胡司(Hus)的門徒發起了類似的改革，為後來復原派的改革運動鋪了一條路。

第十六世紀的復原派改教運動(Protestant Reformation)為基督教帶來新生，可惜對福音廣傳貢獻甚微。歐洲屬靈的復興無疑幫助許多人肯定了信仰的意義，但向外傳福音卻不被看作當務之急。復原派教徒為了

自身的存亡而鬥爭（更可惜的是彼此的鬥爭），以致大使命全被置諸腦後。

正如教會史裏其他改革運動一樣，復原改教運動的屬靈活力始終難以持久。路德（Luther）、加爾文（Calvin）、墨蘭頓（Melancthon）和慈運理（Zwingli）所掀起的熱潮，在許多事上未能掩蓋羅馬天主教傳統教條式的死氣沉沉。復原派在多方面只是改頭換面，仍然是政治的附屬品。

然而一如以往，有形教會無論如何低沉，裏面總有一些往靈性深處追求的人。重洗派運動（The Anabaptist Movement）帶來弟兄會和門諾會（Brethren and Mennonite Churches）的誕生，為歐洲的宗教氣候帶來一股暖流，並且匯入當時一個更為重要的福音派復興運動，這個復興在第十七及十八世紀曾影響了整個西方的教會。

歐洲大陸的敬虔主義（pietism），大不列顛和美洲的福音派運動為基督教帶來蓬勃的朝氣，宣教的熱誠如星火燃點。敬虔主義者與繼承他們的莫拉維亞派（Moravians）分佈在世界各地。英、美信徒關懷美洲本土印第安人的靈魂，並付諸行動。

這種對宣教工作重新委身的精神十分令人鼓舞，並且成為一股新的力量，去完成大使命。近代基督教的宣教運動經過幾個世紀的明暗不定，開始初露曙光。它所凝聚的力量雖然不能阻擋，但過程卻是緩慢不穩定。在一進一退中，使人不得不驚訝基督教如何能一躍成為世界最大，枝葉最茂盛的宗教。

資料來源：

1 Ralph D. Winter, "The Kingdom Strikes Back; The Ten Epochs of Redemptive History," in *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*, ed. Ralph D. Winter and Steven C. Hawthorne (Pasadena: William Carey, 1981), 150.

2 J. Herbert Kane, *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: A Panoramic View of Missions From Pentecost to the Present*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78), 43.

3 Winter, "The Kingdom Strikes Back," 148.

4 Philip Schaff, *The Middle Ages*, vol. 5 of *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79), 588-589.

一、公元初年： 遍傳羅馬帝國

基督教與宣教，兩者有不能分割的關係，假若沒有五旬節後的幾個世紀熾熱的宣教活動，很難想像今天的基督教是甚麼樣子，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。也許基督教會像瑣羅亞斯德教（Zoroastrianism，亦稱祆教）一樣，不過是一個古舊隱晦，只供學者研究，寂寂無名的宗教而已。但基督教從開始便與其它宗教迥異，大使命——那傳遞好信息的命令是它整個信仰的核心。

五旬節後，基督徒把世界翻轉過來。他們跨越巴勒斯坦的邊界，把基督教到處傳開，西至羅馬，差不多滲透了東帝國每個主要的城市。賈禮榮曾經寫道：「在主後三十年才開始的猶太教，到了主後六十年居然成爲一個世界性宗教。」¹

在彼得和保羅這一群偉大的聖徒領導之下，也因為大逼迫和聖殿的被毀（主後70年），很多受過良好訓練的平信徒佈道家隨到隨傳，把基督的信息傳開了。

尼爾（Stephen Neill）說：「那時代每一個基督徒都是見證人，這些早期無名的傳道者是最崇高可敬的。」²在宣教士的年鑑裏也許永遠找不到他們的名字，但他們無疑是歷代宣教士的佼佼者。

這些初期宣教士有幸生逢其時，當時的環境對他們傳播信仰非常有利，尤其與後期那些要被荊斬棘的宣教士比較，他們在事奉上的是一條已經鋪好的路。主後幾個世紀，因著羅馬帝國極佳的交通網，人民可以在國內周遊四方，加上當時國泰民安，無形中增添了旅遊的興趣。

另外，希臘文是羅馬帝國通用的語言，基督徒無論到那裏，都可以毫無困難地把福音信息傳遞出去。這與後期大多數宣教士被迫忍受那種詰屈聱牙的語言學習比較，當然勝了一籌。

還有一個有助於基督徒公開見證的因素，就是會堂的開放。使徒行傳多處記載在猶太會堂的講道，其實就是一些公開的論壇。耶穌死後幾十年中，基督教思想就是透過這些論壇散播到整個羅馬帝國。雖然逼迫事件層出不窮，但公開的辯論仍然是當時社會所容許的。一般人對新奇學說存開放的態度，他們渴望在異邦那些冷酷無情、懦弱無能的神秘宗教以外找到滿足。

是梳毛工人、補鞋匠、洗衣工人等，都是些沒有受過教育，極其無知的人。⁵

這就是當時信徒傳福音所引起的反應。另一方面，他們愛心關懷的見證對福音的傳揚的確有很大影響，他們的愛心遠近馳名，最大的證人不是基督徒，而是一些抨擊基督教的人。猶利安大帝 (Emperor Julian) 是希臘主義 (Hellenism) 教徒，他稱基督徒為無神主義者。他覺得自己教派裏的人與基督徒相比，顯然大為失色。他曾寫道：「他們對陌生人的愛心服事，對死者的細心埋葬，無形中使他們的無神主義擴張得更大。猶太人中竟然找不到一個乞丐，那些無神的加利利人不但關懷他們的窮人，也關懷我們的窮人，反而我們自己當中有人需要幫助，卻無人幫忙。這是多麼羞恥的事！」⁶

早期基督徒不但在生活中見證神，也以死來表明信心。在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公開接納基督教以前，所有公開承認主名的人都會面臨逼迫的威脅。當時殉道士的總數雖不至如某些歷史家所估計的多，而且還是地區不同、時間不同。但是無可否認，基督徒在官方虎視眈眈之下，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。

自司提反被人用石頭打死，基督徒隨時準備遭遇同樣的命運，無形中把掛名的基督徒分別了出來。逼迫的火潔淨了教會，而無辜受害者所表現的勇氣，使非基督徒不得不另眼相看。

尼爾寫道：「有些異教徒目睹基督徒受審、被處死，當場悔改歸主，這些事件都是證據確鑿的。」⁷正如第二世紀護教者特土良 (Tertullian) 的至理名言：「殉道士的血是教會的種子。」

逼迫與殉道的事件吸引了許多人歸主。另一方面早期護教者那些極有條理，言之鑿鑿的辯詞也引導了一些重理智的人歸主。基督教的源流與羅馬帝國其他許多宗教不同，絕非根源於神話或魔術，而是有真實的證據和歷史的事實。單這一點，足可使異邦哲人對福音另眼相看；由使徒保羅到雅典，許多初期信徒都看到這個特點，其中有俄列根 (Origen)、特土良 (Tertullian) 和殉道士游斯丁 (Justin the Martyr) 等護教家，把基督教理性的一面發揚光大，影響不少知識分子，使他們皈依基督。

然而，第二世紀傳福音的震撼力，到了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代便開始式微；基督教成了國教，教會裏面盡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，他們對政界和社會名利的追逐，比對屬靈事物更感興趣，基督教遂淪為一種時尚。在文明的羅馬帝國內，講究的建築物代替了樸素無華的家庭教會，死板的教條代替了真情流露的見證和禱告，本來積極進取的福音工作，也變為表面功夫。

當時，在邊疆的蠻族匈奴，正威脅著羅馬帝國的安危。為了安撫他們，羅馬政府極力鼓吹傳福音的活動，希望能使他們改「邪」歸「正」。政府大力支持熱心的佈道家如都爾主教馬丁 (Martin of Tours) 的工作。他是第四世

紀的士兵，曾入修道院，後來把福音傳遍法國鄉村一帶。

但在最早期，最具影響力的「外國」宣教士，與羅馬帝國及教會完全沒有任何關係。例如：亞流派 (Arian) 的烏斐拉 (Ulfilas) 和賽爾特人 (Celts) 帕提克 (Patrick) 和科倫巴 (Columba)，他們與羅馬帝國本來沒有任何直接關係，但他們傳福音的結果卻使歐洲一些地方更容易吸收羅馬的文化，他們最重要的目標是傳福音，並配合栽培工作，但在以後幾個世紀裏，這目標常退居次要的地位。

資料來源：

1 J. Herbert Kane, *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*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78), 7.

2 Stephen Neill, *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* (New York: Penguin, 1964), 24.

3 Neill, *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*, 39-40.

4 John Foxe, *Foxe's Christian Martyrs of the World* (Chicago: Moody, n.d.), 41.

5 Neill, *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*, 45.

6 Neill, *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*, 42.

7 Neill, *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*, 43.